

郭双林
总策划

大学历史论文读本系列

上册

中国近代史读本

Readings in Histor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郭双林 王续添 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近代史读本

上册

Readings in Histor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郭双林 王续添 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史读本(上、下)/郭双林,王续添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

ISBN 7-301-09422-1

I. 中… II. ①郭…②王… III. 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K25.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3154 号

书 名: 中国近代史读本(上、下)

著作责任者: 郭双林 王续添 主编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422-1/K·039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58.75 印张 930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总 序

编辑出版这套《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愿望：配合高校历史专业的教学，在教材和原始文献资料之外，为广大学生提供一个研究性学术论文的选本。

教学改革是个常讲常新的话题。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就历史学专业而言，在课程设置方面，为促进学科间的渗透，在学科主干课之外，一些院校先后开设了文学、哲学甚至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课程；在课时安排上，压缩课堂授课时间，增加课外阅读量；在教学方法上，满堂灌的教学方法逐渐被淘汰，研究型、启发式教学得到提倡；在教学手段上，多媒体得到推广。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毋庸讳言，随着近年的扩招，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一些院校的教学质量呈下滑趋势。其中在大学本科（甚至包括部分研究生）中存在着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一是阅读量严重不足，二是写作能力亟待提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受教学条件的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受旧有教育观念束缚。为了增加广大学生的阅读量，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于 2002 年向全国高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推荐了《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基本阅读书目》。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我们今天又编辑出版了这套历史学专业学术论文读本。

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为自近代新史学产生以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按照学科分类，编为《中国古代史读本》（上下册）、《中国近代史读本》（上下册）、《外国史读本》（上下册）、《史学理论读本》、《史学史读本》、《历史地理学读本》和《考古学读本》等 7 种 10 册，每册 40 余万字，共计 400 余万字，涵盖了历史学专业除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以外的 6 个二级学科。参编人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专业的部分中年教师。

我们选文的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知识性。即选文适当考虑覆盖面，尽可能顾及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知识领域。（2）典型性。即所选文章

在研究思路上应该具有比较突出的创新性,或者说范式意义,可供读者反复品味揣摩。(3)规范性。即论文题目的选择、切入的角度、思维逻辑的展开、资料的运用和文字表述必须符合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4)可读性。即入选文章在行文上应该明白晓畅,或独具一格。

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作了如下规定:第一,编选者的文章概不入选。第二,重文不重人。第三,除个别卷帙外,原则上全书每卷每人最多只限选一篇。第四,海外作者要占到一定比例,等等。

由于全书跨度太大,受既有知识储备的制约,目前的中年学者很少有人能贯通各卷。为名实相符,本丛书只设总策划而不设总主编。总策划负责全书的策划和组织工作,质量则由各卷编选人员自己负责。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编委会对编选方针和原则进行过多次讨论,但真正操作起来,颇难完全一致;加之入选文章涉及众多领域,出自多人之手,时间跨度比较大,因此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水平和风格上的差异。

编选这样一套学术论文读本,可能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可以入选的文章太多,受全书规模的限制,不可能使所有高质量的文章都能入选。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特别在每篇之后增加了参考篇目,一则可使读者加深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再则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以便进一步扩大阅读范围。即便这样,对哪些文章应该入选,哪些文章应该列入参考篇目,拿捏起来亦颇感困难。见仁见智,尽力而为。聊以自慰,亦堪自嘲。

记得白寿彝先生在一封与人论读书的短笺中说过:“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帖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读。”先生还以《诗经·邶风·墙有茨》中将“不可读”排在“不可道”、“不可详”后面来说明,认为“读”有“抽绎”的古义。(《与人谈读书》,《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作为编者,我们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这套丛书时,能像书法家读帖读碑,画家读画那样,细细品味,反复揣摩,真正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本丛书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张凤珠女士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在此谨致谢意。诚望海内外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郭双林

2005年10月

目 录

总序 郭双林/I

上 册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

研究 罗荣渠/1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 林增平/20

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 王尔敏/55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蒋廷黻/150

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 庞 朴/182

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 龚书铎/204

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 茅海建/218

再论天朝田亩制度——重考天朝田亩制度实施

问题 罗尔纲/241

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 胡思庸/269

李鸿章和轮船招商局 胡 滨 李时岳/294

论“中体西用” 陈旭麓/314

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 张荫麟/335

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 章开沅/360

从《实理公法全书》到《大同书》 朱维铮/379

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 李文海 刘仰东/404

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谋略及其失败 桑 兵/423

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考实——兼论同盟会在组织上的

特点 金冲及 胡绳武/440

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兼论蜕变中的

政治精英分子 张朋园/464

《戊戌奏稿》的改纂及其原因 孔祥吉/496

目
录

下 册

- 五四运动与 20 世纪的中国 彭 明/512
- 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 耿云志/524
-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李泽厚/547
- 中国军阀派系诠释 [加]陈志让/580
- “中山舰事件”之谜 杨天石/604
- 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 罗志田/622
-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
转向民族传统 王桧林/655
- 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
历史考察 黄兴涛/671
- 南京大屠杀研究 [日]藤原彰/731
- 论中苏同盟的起源 牛 军/761
- 1944 年至 1946 年间国共力量的平衡与政争
邓 野/783
- 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
[美]帕克斯·M. 小科布尔/810
- 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 郭德宏/835
- 略论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王金铨/851
- 论民国政制 陈瑞云/869
- 重评《多余的话》 陈铁健/887
-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 杨奎松/903
-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性质与分期
[美]斯图尔特·R. 施拉姆/920
- 编后记/933

罗荣渠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

——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

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但何以被延误,不同人有不同的说法。外因论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延误主要是外来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侵略—反侵略”是这一研究取向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因论则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延误主要症结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性等内在弱点。“传统—现代化”的对立是这种解释的分析框架。本文在此之外提出了“合力”论,即认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合力”所推动的。其中既有选择机会的自误,也有制度性障碍。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更出现“扭曲”与“断裂”现象。

罗荣渠(1927—1996),四川荣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创始人。曾任中国拉丁美洲研究会副理事长。在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进程、美国史、拉丁美洲史、史学理论、二战史等领域颇多建树,主编有《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等,著有《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篇》、《美洲史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等。

一 现代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

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第一次战争始于鸦片战争。这次战争标志着中国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全面冲突。这次冲突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性发展的格局,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纪元。纵观这一个半世纪的沧桑巨变,是一个举世罕见的漫长而崎岖的现代化历程。

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延误了的现代化(the delayed modernization)。对中国现代化延误的探索,长期以来是中外学术界都关注的中国历史发展之谜。为什么一个在前现代世界长期发展领先地位的悠久文明,在向现代化世界转变的过程中如此步履艰难,险阻迭起,前路漫漫?

应该说,近几十年来对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许多看法,立论各不相同,大致可归纳为两种基本观点。

一种观点可称之为外因论,即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延误主要是由于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渗透和帝国主义侵略。“侵略——反侵略”,是这一研究取向的基本分析框架。国内采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史框架,分析的主线不是现代化问题,基本取向与外因论大致相同。这也是战后苏联、西方和日本的激进史学的主流倾向,早为我国读者所熟悉。70年代以来,由于新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兴起,为这一研究取向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2]

一种观点可称为内因论,即认为中国现代化延误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落后性、制度的独特性、中国历史发展的停滞性等内在弱点。“传统——现代性”的对立是这种解释的分析框架。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儒学有碍资本主义兴起的观点一直到当代的西方现代化理论,都为这一研究取向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代表当代西方的中国研究的主流派。^[3]

以上两种研究取向,不论是外因论和内因论,都是各执一端从其所善。对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都有独到的见解,但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外因论把史家的注意力引向中国近代发展的外部因素,实质上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观。从表面上看,帝国主义侵略论似乎是反西方中心论的,但如果只承认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各种变化的主导因素,忽视了中国的历史特点和国情特点,把内部问题简单地归之于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

的屈服投降,而排除这一复杂历史过程中的多样性选择,实质上仍是一种隐蔽的西方中心论。从哲学上说,也违反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内因论把史家的注意力引向近代中国发展的内部因素。表面上看似乎更加深入,由表及里,强调了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和具体国情,却抹杀了或淡化了外国帝国主义造成中国现代化扭曲和“断裂”(breakdown,或译为挫顿)的直接作用,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倾向。

近年来,为了纠正西方中心论的偏向,有的西方学者从中国的角度出发重新解释 19 世纪中国改革运动,加强对中国的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深入研究。美国学者柯文把这种新的研究趋向称之为“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即所谓“中国中心观”。这一努力不是要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而是试图把“起点放在中国而不是西方”看问题。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应克服将历史挤压成单一方向的认识方法,寻求更具综合性的全面性的视野”。这些想法能否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这个老大难问题,还有待具体研究成果来证实,常见的情况是,按照流行的西式“现代化”理论分析框架,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就不大看得见了;一旦强调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又容易摆向抹杀现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的一面。

这种“内”、“外”摆动的倾向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复杂性。我认为这一历史复杂性,从根本上来说,在于中国近代变革中不同性质的多重矛盾纠缠在一起:一是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一是正在兴起的具有世界性的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前现代的中国农耕文明的矛盾;一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的矛盾。这三重矛盾的交织,既是世界历史处在有史以来的大转变时代所产生的复杂现象,又是东西两大文明体系相会的必然撞击。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历史的悖论,诸如,文雅的落后被野蛮的先进所打败,穷困与屈辱推动民族的奋起与进步,社会机体的解体促成社会革命,等等。这大概就是马克思提到的“两极相逢”产生的“对立统一”吧。^[4]

总之,不论是“西方中心”观还是“中国中心”观,都是片面的。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作用的“合力”所推动的。这一巨大的转变过程应该按其本来的复杂性,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全面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正日益汇合,今天有更好的条件研究这一课题。既从中国看世界,也从世界看中国。这些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本文只是对综合分析

的新方法的一种粗浅的尝试。

二 选择机会的自误

近世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大变动的过程。这个大变动必须放在近世世界的大变动进程中加以考察,才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些。

纵观近代东亚各国史,印度、日本、中国在西方冲击下经历三种不同的命运,正好代表三条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印度丧失自己的独立而沦为殖民地;日本成功地克服殖民地化危机发展成为独立工业国;中国丧权辱国,走上半殖民地化的扭曲发展道路,这不同的遭遇表明一个国家或民族应付外来的挑战有多种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既取决于外来挑战的性质、特征和强度,更要取决于被挑战的主体本身内在结构的牢固性、发展水平和应付外来挑战的手段与能力,等等。马克思在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人资本对旧的生产方式起多大的解体作用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5]在这些话里,只要把生产方式扩而大之,即扩为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对于研究近代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冲击下非西方国家或社会的解体过程,换句话说,也就是非西方后进国家现代化的启动,将具有同样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印度是亚洲的一个文明古国,它在来自海上的西方殖民势力袭击下之所以比较容易地逐步解体,在于这个国家内在结构的脆弱性。印度在政治上实际上是由许多分散的小邦国构成,社会的基础是封闭的村社制度,又被种姓制度所割裂。漫长的海岸线上海防薄弱,这些内在结构上的不坚固性,使这个庞然大物的“帝国”不难被零打碎敲地解体。与印度相比,日本只是一个小岛国,但它是单一民族,有单一的文化传统,皇权的绝对主义统治,经常戒备外来侵略,有较高的危机意识,这些因素使它具有很强的内聚力。但日本人又具有外向性,对学习外来的先进事物有很高才能,这一优点使它对外来新事物有较高的容纳能力。中国在这三个国家中(也可以说是在全世界)具有很高的内部结构稳定性和牢固性,自秦以后就一直保持大陆帝国的统一发展格局,王朝的兴亡只是帝国的被打破和再修复。中国从来没有像罗马帝国或印度那样真正崩溃而不再整复

过。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灿烂的华夏文明,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政治—文化同构,这不仅极大地加强了中国传统历史格局的牢固性,而且华夏文明长期以来都是向外辐射的。这是因为中国在东亚大陆地缘政治具有独特优越地位,外来“挑战”和“威胁”在文化上最后都同化于中国。中国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特有坚固性,是中国两千年历史运动形成的钟乳石沉淀。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牢固性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应从多方面进行研究。

从16世纪新航路开通以来,世界开始发生大变化。当时中国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西方在许多方面倒是处在“欠发达”或“不发达”状态。^[6]当时实际上是中国“冲击”西方,而不是西方“冲击”中国。早在中世纪的陆上贸易时期,中国的四大发明就造福于西方。新的海上贸易开通后的一个时期,实际上是西方受到中国的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哲学、政治学与艺术方面),而不是中国“西方化”(只有美洲作物的引进对中国发展产生重大影响。^[7]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握有自己的主动权,因此,不要以为新航路一开通西方就冲击到中国了。

从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贸易据点(1557年)到鸦片战争,在将近三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中华帝国在经济、政治、贸易文化等方面都可以与任何新兴西方海上势力相抗衡。尽管西方国家千方百计想对中国进行贸易渗透,都未获得成功。武力入侵也有多次,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荷兰舰队对澳门的进攻(1622年),荷兰趁火打劫侵占防守薄弱的澎湖和台湾(1624—1662年),但最后均遭失败。^[8]从陆上来犯的是俄国人在黑龙江流域发动的第一次战争,也被击败并订立城下之约(1680—1689年)。这些反击大致保持了两百年的安宁。在这期间西方势力席卷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却始终未能越过中国的南大门一步。海上西方商人与中国的贸易被限制在广州一地,而且只能通过“行商”进行。

环视东亚大陆,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有力量如此长久地成功地抵挡了西方的海上挑战。这说明古老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牢固性,这是处在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的西方商业资本主义难以撼动的。

但是,在中国抵挡西方挑战的成功也掩盖了中国对发展选择的失误,在新航路开通、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西方商人热衷于东方贸易。当时中国占有南洋贸易的优势,对东西贸易本来握有主动权和选择

权。通过开拓新的远洋贸易“帆艚通四海”，赚取比较利益，中国完全可能发展成为新兴贸易大国（当时已通过马尼拉间接开辟“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与西欧国家平分秋色。遗憾的是，中国在世界贸易从大陆转向海洋的重要时期，却背道而驰，突然闭关锁国，采取退缩政策，结果是坐失良机^[9]。把本来有利的海外贸易变成自己的包袱，中国商人在南洋开拓的许多贸易基地被西方商人夺去，这对中国以后的发展发生了决定性影响。透过历史的表象，这些选择的失误，正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结构老化、僵化与缺乏随应形势变化的弹性所造成的。

西方商业资本主义东进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为了打开广大富饶的中国市场。中西冲突的焦点最早是中国传统朝贡贸易制度与西方自由贸易制度的对抗。中国死守这一过时的制度不改，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自给自足小农生产方式的稳固性和王朝财政制度的单一性，加之历代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安定社会和防止民间权势增大的一种重要手段，从而缺乏开拓海外市场和原始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而不是一般的反对商业和贸易）。明清的帝国体系看来很庞大，实际上经济的结构与功能很简单。更有甚者，这一套经济体制的牢固性并不仅仅在于制度本身，还在于它得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悠久深厚的文化系统的支持与加固。这样，中国的自足发展体系就完全牢不可破了。中国的封闭政策能在两三百年中我自岿然不动，奥秘就在于此。

构成中国自足发展体系的核心价值观是自居于万国之上的“天下国家”观和“夷夏之防”的儒家理论，并转化为中国人的“自我形象”（self-image）意识，一直成为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式。任何外来事物与此正面撞击都会引起正面冲突。在这方面，早期东来的聪明的耶稣会士打开进入中国大门传教的方法是：首先自我“中国化”，然后再使中国人“基督教化”。为迎合中国人的“中国中心”意识，利玛窦向明廷所献的世界地图，就精心设计，把中国的地理位置安排在“中心”。但三百年前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一书中，对中国人的这种“天下国家”观念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

因为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羨。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明是值得

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愈骄傲,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愈自卑。^[10]

在东亚各国中,日本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最为相似,近代时期都长期锁国;日本对西方的看法完全接受中国的“华夷”世界观,也坚决主张“攘夷”。所不同者是,日本的传统结构的外壳不像中国那样的牢不可破,它经常吸收外来的养分。因此,当日本人素所仰慕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之后,日本有识之士大为震惊,很快认识到中国因“虚骄自尊以卑视海外万国”而招来大祸。1854年在美国炮舰的压力下打开门户后,日本就迅速改变了对世界的认识:“近来宇内大开,当各国争雄四方之时,独我邦疏世界之形势,固守旧习,不谋一新之效”。于是公告世界:今后与外国交往“遵循万国公法进行”。在明治天皇1868年颁发的“国是五项誓文”中,把“寻求知识于世界”提到国家基本政策的高度。^[11]由于日本迅速认清“各国争雄”的国际大势,明治时代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几乎半数亲身周游欧美,考察各国富强之道,对日本进行制度改革应如何效法能很快就做出主动的选择。当时日本也受到西方国家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但程度比中国轻),朝野人士要求修约。这个运动与日本整理内治,走向君主立宪齐头并进。由于对现代世界认识基本转变,日本在学习和运用西方外交手段与法律方面表现充分的主动与能力。这样,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国际地位的改变,日本陆续废除了与西方各国间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关税自主等权利(1911年)。^[12]

对比之下,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被卷入前途未卜的现代世界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清王朝统治者却依然死抱住“中国中心”的残破罗盘,找不到自己在现代世界坐标上的准确方位,从而无法把握正确航向。中外关系中长期纠缠的“觐见”礼仪这个问题,就是对外关系中盲目无知的一个典型的事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在1858年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写明今后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时不可行“有碍于国体之礼”(即行叩头的屈辱性礼仪)。此后,清政府为了维护天朝皇帝至尊无上的虚假“形象”,仍然纠缠不让步,以致激起整个外交使团的愤慨,使对外关系中增添不必要的对立情绪。割地赔款可以不争,这个问题却非争不可。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拖了半个世纪,到1863年同治皇帝举行亲政大典时才算勉强解决。可见,如果要在我国推行一项“有违祖制”的实质性改革,其阻力将是多么巨大,更是可想而知了。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经过两次军事较量的失败,愚昧的“以商制

夷”的办法,彻底破产,原来对西方不平等的朝贡贸易制度一变而为对中国不平等的条约口岸贸易制度,洋人在中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又取得特优的低税与内河航行权,攫取香港澳门主权,等等。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在部分士大夫之中才激起了巨大思想震动,认识到中国历史格局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而西方国家乃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60年代以后,士大夫中提出“世变”新论调的,不下六七十人^[13],由是而采取了某些“应变”措施,如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学习西方语言的同文馆,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搞一点“防御性现代化”,目的在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总算是中国对西方严峻挑战发出的积极回应,尽管已延误了二十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学习“西学”与当时日本学习“西学”的态度大不相同。日本人原先也是诚心诚意崇拜和学习中国儒学的,及至被迫开国和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中认识到西洋技术的优越性后,就迅速转向学习“西学”,而中国则不然。中国士大夫学习西方的富强之道大多数是从传统的“经世之学”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学习现代科学的观点出发;而且在学习“西学”时,提出了一套“西学源出于中学”的理论,引经据典加以论证,以表明“中学”比“西学”高明与“西人由外而归中”(郑观应)。当时倡导此说的人,包括著名的维新人士如冯桂芬、郭嵩焘、曾纪泽、郑观应、薛福成、黄遵宪等在内。^[14]影响不可谓不大。这种学习西方的方式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足体系的巨大潜在能量以及文化资源的丰富,它能够以西学之新去加固中学之旧,或者把绝然不同的西学改装成一种不中不西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不是被动吸收外来文化,而是把外来文化加以“中国化”,纳入中国固有的思维模式之中,以保持中国的固有发展格局与方向。

闭关锁国被冲破,中日两国的现代化起步处于同一时代。尽管都受到侵略威胁,两国对自己的发展道路仍可以做出自主性的选择。相比而言,日本并不具备向现代化转变的丰富物质资源,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文化资源,而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拥有无比优越的条件。但是日本对世界大势有比较清醒认识和广求宇内知识的热忱,使日本的文化资源得以迅速革新和增长。这些革新的文化资源成为推动日本物质财富巨大增长的精神动力。精神与物质的互动关系从中日两国学习西方之不同,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中国对现代世界认识的严重滞后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变革的难以估量的因素,一直到19世纪末,还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变所必需的基本认识转变。甲午战争前夕,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评论那一时期的中国状况,写道:

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疯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以后,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15]

从16世纪末利玛窦来华到19世纪末施阿兰来华,世界在这三个世纪飞速前进,中国仍在蜗牛般地爬行。“中国中心”的世界观仍然支配着中国朝廷的对外事物。从中国来看,三百年跨过一个朝代的兴亡,从世界来看,三百年使北美海岸一小条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了现代世界强国;仅仅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日本就一变为东亚先进强国,一举打败衰朽的清王朝。中日的强弱完全逆转。在一段本来可以赶上的进程中落伍了,到这时候,历史发展留给中国的可选择的自主性就缩小了。

三 延误的制度性障碍

对所有的后进国家来说,现代化的启动都来自外部的挑战,这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同于前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契机。

在19世纪下半叶,被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或受到浪潮的冲击的国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圈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俄国等;一类是非西方文明圈的国家如土耳其、中国和日本等。前一类大体上是同质文明的传播;而后一类则是异质文明的传播,因而表现出异常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另一不同点是,前一类国家在现代资本主义编织的国际经济体系网络中大多处于中心的外沿,而后一类国家则大多处于边缘和半边缘地位。

外国的侵略与挑战和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常常成为引发大变革的动因或催化剂。这在历史上数见不鲜。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遭到拿破仑战争的蹂躏,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土耳其在俄、土战争中失败,日本被美国炮舰轰开锁国的大门,都成为各国改革运动的外部推力。清末,中国的改革派和维新派也常举俄、土、日的维新和改革作为效法的榜样。

中国对鸦片战争这样严峻的挑战并没有立即引出积极回应,而是当做地方性问题消极应付的。林则徐、魏源已提出“师夷制夷”的加强国防的新应策,但没有引起清王朝统治者的任何注意。时光白白浪费了二十年,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贻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下,中国才慢腾腾地迈出了“师夷制夷”即防御性现代化的第一步。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清政府中的一批主持“洋务”的官员,倡导“强兵固本”,办起军工厂、造船厂、开矿山、雇用外国技工、翻译西学著作、派遣留学生……,这些新措施标榜为“自强新政”,或“同光新政”,现在人称为“洋务运动”。从国际环境来看,这三十多年来正是世界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期。^[16]东邻的日本人就是在这一代人时间中奋起直追,改变国家基本面貌的。从国内环境来看,这段时间形势安定(只有中法关系恶化),是有利于推动改革的好条件。由政府倡导兴办现代化工业,这也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兴办新式军事工业以图自强,是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的常见形式之一。就清末这次“自强”运动来说,则是这种形式的最保守的努力。这一论断是有许多根据的。近代君主制国家在西方冲击下,为维护帝国的生存,采取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寻求出路,一般都从抓军事改革入手。与此同时,一般都要着手进行教育改革、法律改革甚至土地改革,并唤起共赴国难的民族奋起精神。“自强”运动却不是如此,只是孤零零的单项表演。清政府特别不可能去进行全民族的精神动员,此其一。各国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由中央政权领导的全国规模运动,“自强”运动兴办的各种厂矿企业都是地方级的,由督抚大员经办,形成互不相干的独立中心,各自为政,与地方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相联系;而涉及重大的建设措施,督抚无权决定,往往延误而无法进行,此其二。各国现代化一般都以启蒙思想运动为先导,特别注意发展国民教育计划,以培养新式人才。日本90%以上居民住在离海岸50英里以内,围绕三都及长崎形成四大文化中心,全国的人口和商品都以这些为中心集散地,传布全国,在明治时期